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以开放促改革

——全球化新趋势与对外开放新阶段

黄仁伟 张幼文 金 芳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014035941



智库报告

D616

455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以开放促改革

——全球化新趋势与对外开放新阶段

黄仁伟 张幼文 金 芳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北航

C1723156

D616
4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新趋势与对外开放新阶段/黄仁伟,
张幼文,金芳等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新开放论丛/张幼文,徐明棋主编)
ISBN 978-7-5520-0500-4

I. ①以… II. ①黄… III. ①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8220 号

以开放促改革

——全球化新趋势与对外开放新阶段

著 者:黄仁伟 张幼文 金 芳等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30

插 页:2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500-4/D·270

定价:8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作者

本书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集体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由黄仁伟、张幼文、金芳总体负责,提出研究思路和框架,组织团队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全书由吴雪明进行统稿。各章节的执笔人分别是:

- 总序:张幼文、徐明棋;
- 前言:张幼文;
- 第一章:李凌;
- 第二章:黄烨菁;
- 第三章:范非凡;
- 第四章:徐艳红;
- 第五章:匡增杰;
- 第六章:李凌;
- 第七章:周大鹏;
- 第八章:胡大龙、薛安伟、马飒;
- 第九章:薛安伟、叶成城;
- 第十章:黎峰、陈钧浩、邓志超、徐海涛;
- 第十一章:黎峰、陈钧浩、邓志超、徐海涛;
- 第十二章:苏宁、胡大龙;
- 第十三章:李珮璘、周大鹏;
- 第十四章:周大鹏;
- 第十五章:张娟、吴雪明;
- 第十六章:傅钧文、赵蓓文;
- 第十七章:赵蓓文;
- 第十八章:李凌;
- 第十九章:黄烨菁。

芮超茹、刘雯等承担了调研问卷、资料收集等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总 序

当下的中国,正全面寻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全面的创新中,开放的创新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开放的创新是国家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是对外开放战略面向新目标的需要,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需要。中国需要培育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开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空间,即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新开放”。

在未来5—10年中,需要推进新开放,其核心是构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战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东南部创体制、中西部上层次的东西并进格局。

一、以完成 BIT 谈判和参加 TPP 合作为动力构建

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重要现象。这一趋势将大大提高对各国开放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内容上更多涉及各国国内体制和政府职能而成为对改革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特别相关的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有效应对这两个谈判将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的情况下,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各国推进国家间经贸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选择。

对中国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双重意义。就对外开放而言,这将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对外投资的空间。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这一领域扩大开放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实现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机遇,中国有条件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平等互利,公平对待我对外投资扩大,并尽早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

就国内改革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经济制

度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审批制以及政府职能上的多方面问题,已经远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而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要求正与国内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能够有效地倒逼机制、推进改革。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在开放中赢得竞争。在大部分主题上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一体化与我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就能够在开放型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必须坚持。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区分政府主导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要坚持原则,并要求美方承认我国经济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以探索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

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再次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课题。沿海地区的开放不仅有着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意义,而且承担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探索、试验的责任。

在新的阶段上,开放升级的内涵包括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开放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体制性开放。1979年搞经济特区是政策性开放起步的标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区的核心。在这以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各种意义上的特殊政策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在前30多年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对旧体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整个经济走上开放道路,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继续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作用有限,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不利,地方政府间的政策竞争降低了开

放的整体效益。特别是特殊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与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与服务业的低开放度都制约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要把体制性开放作为实施新开放的基本要求。所谓体制性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既要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导向作用,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中的互补作用,又要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中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体制探索。沿海地区自贸区建设是新开放的标志,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是整个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上体制性开放的试验田。要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贸易区试验真正产生全局性的意义。为此,对自由贸易区应明确以下要求:

第一,体制机制的可复制性。要明确自由贸易区是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飞地。因此,更优惠的税收、关税、政府补贴或土地价格不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为全局性的政府减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复制性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广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自由贸易区的重点要放在国家未完成的各项改革的探索上,以发现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通过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构造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现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通过参照国际规范与惯例形成各项改革的有效举措。通过试验到复制推进全国改革是新开放的顶层设计,因而“可复制性”必然是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是对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试验。从外资外贸的规模上讲,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是从产业上讲,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特别是金融与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形成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方向。要通过自由贸易区对这些

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开放检验的方式,发现外部冲击,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操作性试验发现其中的难点与问题,为国家全面推进这些市场化重大举措提供依据。因此,新开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化与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题,新开放就在于利用国际规范与外部动力推进这一改革。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是市场开放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根据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新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对跨国公司约束要求的增强,东道国政府要防止跨国公司环境倾销,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要监督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进步和人才成长,在开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新开放就在于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在坚持开放中有效形成这些职能,提高开放水平。

由此可见,科学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利于建设开放型的经济体系。由于自由贸易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境内关外保税区,不是封闭的,而是试验性的,因而运行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隔离,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扩散将是其重要特征。科学有效地把握自由贸易区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及时发挥自由贸易区体制的模式传递作用,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从试验到推广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我国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推进新开放,将带来整个沿海地区开放的升级和改革的深化,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新局面。

三、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各具特色, 联动发展为目标,创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 30 多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面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展目标迈进阶段到来之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在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上,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应当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各地区的开放却不能采用同一模式。内陆和沿边地区都不能简单重复东部开放的道路。中国开放的基本经验和东部模式的核心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不当直接作为内陆或沿边地区的模板。国家整体致力于地区间均衡发展之时,也正是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之际。与沿海当年的出口导向型相比,内陆地区要实现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而这正是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发展条件下,内陆地区获得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的机遇,即以进口关键装备、零部件实现自主投资与创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与此不同,沿边地区则既不可能是外资拉动型的,也不可能是出口导向或进口推动型的,而应当以与相邻国家的双边或诸边合作为特点,其具体模式因地制宜。

第二,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目标要升级,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开放战略的目标定位。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必须实现战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其中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以及各战略经济区域都需要实现升级,才能形成各地区协同升级,各战略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目标既取决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又要从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相应目标。沿海、内陆和沿边各地区都要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确定不同的开放目标。现代服务业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未来开放的主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面向外部市场也仍然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以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并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内陆其他地区则更多需要致力于资源产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沿边地区有的要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有的要以双边诸边经济合作推进稳定周边环境的建设,从而启动各具特色的发展。

第三,各地区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新的协同与互动关系。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各地战略与开放模式上需要形成协同与互动关系。前30年开放中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向沿海曾经是沿海地区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提高了内陆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推动了脱贫事业。随着劳动力结构与数量的变化以及内陆发展机遇的扩大,这种协同与互动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沿海出口加

工型产业特别是轻型低运输成本类产品向内陆转移既可以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沿海地区腾出空间实现结构进步。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既要走开放型发展模式,又应当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相互支撑。在沿海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内陆体现开放型竞争的實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又能为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产业配套和人才流动等各个方面增强沿边对外合作的水平。从总体上讲,优化国家的区域开放格局要形成三个战略的协同:一是深化改革,使沿海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二是扩大内需,将外资引向内陆地区;三是创新模式,以多样化构建沿边对外合作。

第四,衡量开放推进的指标需要历史性地改进。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沿海地区以外资外贸规模作为开放度指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国家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也不同,内陆地区应探索以新的指标来鉴定开放水平。在新阶段上,沿海地区开放要以现代服务业外资引进为重点,同时关注现代制造业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方面的各种国民经济效益指标。沿海中心城市还要关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的实施进程,以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沿海地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推进中国走出去进程和主动构建国际分工能力,获得中国高级稀缺要素,应成为沿海大城市的战略重点。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仍然需要以外资与外贸来体现开放度的提升,但在制造业出口上要更多注重现代高端产业和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贸易方式上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发展相对更高的速度,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值的提升。进口既是中国市场优势的体现,也是内陆地区在开放中发展的路径之一,内陆以进口而不是单纯以出口体现开放,是与以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要注重具体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外资外贸,以此来体现其经济与政治辐射的影响。

第五,对外开放战略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总战略中的一个方面,要服务服从于国际总战略,为总战略的需要定位。区域战略的选择同样要贯彻这一原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要成为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结构进步和开放领域扩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已经向国内体制改革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法律制度,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课题。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需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化将成为沿海地区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陆地区的市场战略同样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体现水平的同时,内陆地区要体现规模与实力,沿边地区要体现策略与多样化,共同构建中国开放的整体部署。大西南是中国沿边地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其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将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这一国家战略,又将对内陆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张幼文 徐明棋

2013年9月

前言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制度安排,其以公平贸易维护了经济全球化的秩序,促进了全球化的顺利发展。然而,自21世纪初开始的世界经济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却难以有效推进,以至于各国对这一组织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怀疑。

应当指出的是,多哈发展议程的困难并非全球化的停止或逆转,这一组织已经达成的各种协议及各国对其贸易争端等制度安排的尊重依然对全球化的有序运行发挥着关键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多哈议程的困难表明这一组织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需要,成员方经济特征与发展需求的巨大差异,使这一组织的谈判与承诺机制等难以适应回答各种新议题的需要。

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区域与双边、诸边一体化蓬勃发展,出现了大批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与双边投资协定。这一动态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其正寻求在世界贸易组织下难以实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和美国主张的双边投资协议模式,正在以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推进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这是与新一轮全球化有着根本不同意义的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及其发展到世界贸易组织,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自由贸易区等,是前一轮全球化的制度载体,其核心是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即关税减让与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形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但其本质仍然是市场的开放。各国可以为市场开放作出承诺并相应地进行国内改革,但市场准入仍然是一道门槛,外资获得国民待遇只是在准入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国民经济依然保留着适合于本国调控需要的制度安排。

前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现象。跨国公司不仅需要市场准入,而且需要在东道国获得更加透明规范和与其发达经济母国相似的投资环境,以得到稳定的发展与利益保护。这就使国际直接投资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国民待遇上升为重要主题。在前一轮中,全球化化解了国民经济间的商品与要素流动障碍,而在这一轮中,全球化又将化解各国经济中的非市场经

济因素,获得更透明高效的政府行为,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规范安全的法律保护,等等。简而言之,与跨国公司运行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都成为开放的主题而要求国家作出承诺与安排。因此,国内体制意义上的改革与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已经替代了国境壁垒意义上的降低与市场准入的逐项承诺。市场化与国际化几乎成为同义语,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几乎成为同义语。

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形成新趋势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两者的同步并非时间上的简单重合,因为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充分利用前一轮全球化机遇而实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特点与全球化进程的相关性。前一轮全球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传统产业的转移;二是某些新兴产业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中国通过引进外资抓住了前一个机遇,通过加工贸易抓住了后一个机遇,两者的共同点是以政策激励加以推动。在前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接受了国际规则,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了国内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了经济大国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一个政府职能很强的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广泛的发展规划,有力的政策刺激,严格的审批制度,多样的部门保护,形成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中的制度屏障,既成功保护了国内金融与现代服务等弱势部门,也限制了自身的结构升级与发展空间。在中国的发展导向型体制中,既包含着以政策激励引导发展的高速增长优势,也产生了行政不透明与竞争不公平弊端。过强的政府职能也伴随了虚弱的市场发展,金融等市场发展的滞后使民营经济发展受阻,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

中国经济由大向强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再一次要求以深化改革来推动发展,而政府自身改革的困难再一次使人们寻找外部动力——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实现经济大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市场经济法制化和政府职能透明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前一轮全球化的主题是市场开放,那么新一轮全球化的主题则是市场深化,即一个更加适应于全球化经济的体制建设。如果说前一轮全球化的体制建设是建设一个国际体制,那么新一轮全球化的体制建设则是要求各国按一个相近的标准改革国内体制——全球化的市场体制建设深化到各国国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改革深化的要求与全球化市场深化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利用全球化的要求,使其成为国内改革的动力。以开放倒逼改革不只

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种客观条件,是一种新机遇。也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不能利用全球化倒逼改革,则将在全球市场深化的体制建设后成为体制之外的一员,或者不能共享体制的利益,或者再一次面对加入这一体制的大量承诺的压力——如同又一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难。

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大主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审批制是国内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痼疾,低效率、高扭曲,甚至成为腐败的温床。在对外开放中,审批制不但存在着同样的弊端,而且还导致开放成为不可突破的一道玻璃墙。把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把事前的准入控制改为事后的监督管理,是政府职能的一大转变,也是市场化透明度提高,减少扭曲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安排。

金融与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它是提升产业结构,形成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需要,关系到改变中国仅仅作为制造大国甚至低端加工工厂地位的目标。事实证明,过去的保护型体制维护了市场的稳定与金融等领域的安全,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应对外部竞争能力后的今天,开放型发展将更为有利。事实上这一开放将深刻地调整国内各部门的利益,而由开放推动的改革在于真正实现以国家整体利益超越各个部门利益,以更高水平的国家安全代表各个部门或产业的安全。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显然是又一次必要的改革。

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除了以开放促改革这一条外,另一条就是以沿海带内地。南方特区的对外开放影响全国,浦东开发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带动全国,沿海以其特有的与世界经济的近距离优势为全国改革与发展发挥了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沿海地区的开放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过程,其成功成为全国的示范。这种先行先试的模式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之际,上海又一次被推到了先行者与排头兵的位置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或“自贸区”)正是这种先行者与排头兵定位的平台、载体与标志。上海自贸区的主题是投资而不是贸易,内容是服务而不是制造,功能是制度创新而不是特殊政策。就主题而言,自贸区根本不同于现有的保税区,后者的功能中国并不缺乏。上海要利用自贸区发展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特别是发展离岸贸易,但这实际上是整个上海的城市功能目标。相反,通过吸收国内外投资试验更多领域的开放却是自贸区的更大主题。就内容而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新型的服务业态的发展是国家所需要探索的,从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讲是整个国家各个地区要追求的,其关键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自贸区创造的相对隔离环境。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究竟在开放中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多少冲击,是自贸区试验探索的核心问题。就功能而言,自贸区的责任在于完成国家所需要的改革探索制度创新的任务。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开放上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对外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相应建立各种准入后的全面监管制度,使开放领域的正面清单逐步转变为负面清单;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是国家当前改革开放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在于在有限范围内先作探索性试验,发现问题,改进措施,最后把改革推向全国。它不同于当年经济特区将更优惠的特殊政策进行推进的方式与目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面向全国的复制与推广,达到全国改革开放。

由此可见,上海自贸区战略是新一轮改革开放与发展总战略中的一个重要且关键的步骤,是国家战略而绝不是地方发展战略。

在实现对外开放战略升级的所有讨论中,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前一轮开放中,中国被纳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同时又处于低端地位。理论与实践都表明,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角,是国际分工的规划者。在不存在国际投资的条件下,国际分工模式是由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决定的,然而在大量国际投资的条件下,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特别是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则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与价值链布局的主角,其企业行为决定了必然把高增值的高端分工留在自己手上。这也就决定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是一国自己拥有一批强大的跨国公司。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已经上升为中国下一轮开放型发展的重大主题。

培育和拥有本土跨国公司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双向开放或“走出去”,而是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前一轮开放中国靠廉价劳动力参与了国际分工,进入了世界市场,除了创造就业、拉动增长等之外,相当规模的本国资金与外汇资源沉淀下来。有效运用好这一发展条件是下一轮开放战略的核心。中国需要实现自主创新,通过自主研发和经营形成技术与品牌新优势,同时也完全可能通过国际并购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获得成熟国际企业及其所拥有的技术、品牌、管理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等中国的稀缺要素,实现自己要素结构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从总体上讲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拥有较成熟的国内市场及相应的技术创新队

伍和机制,在技术及市场等创新上具有基础。但是新兴经济体却不具有同样的条件。虽然我们不应当单纯走一条购买各种高级要素的道路,但在注重自主创新的同时用好前一轮发展积累起来的优势,是合理的和可行的,是全球化新条件下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开辟的一种新模式。通过国际并购迅速获得中国稀缺的高级要素,进入他国市场,稳定资源供给,是前一发展阶段的继续,也是前一阶段优势向后一阶段转型的道路。

目 录

总序	001
----	-----

前言	001
----	-----

上 篇

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参与现状的评估

第一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经济事务的评估	003
------------------------	-----

第一节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及参与程度	003
------------------------	-----

第二节 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地位及参与程度	006
---------------------	-----

一、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不断增加	006
-------------------	-----

二、中国完成由受援国到援助国身份的转变	008
---------------------	-----

三、中国专家走上世界银行高级管理层	010
-------------------	-----

第三节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及参与程度	010
-------------------------	-----

一、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不断上升	011
----------------------	-----

二、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务,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014
----------------------------	-----

三、中国专家走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管层	015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的评估	016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评估与贸易自由化进程	016
------------------------	-----

一、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大国地位	016
----------------	-----

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019
---------------------	-----

三、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不断推进	020
----------------	-----